

德国大学的制度结构

鲁道夫·施迪希伟

(德国卢塞恩大学)

摘要 本文以组织进化理论的眼光审视了德国大学近三百年的发展历程,从中抽象出德国大学作为一种制度的基本规则,并运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和梳理勾勒出德国大学历史发展背后的脉络。本文指出,德国大学的制度核心,即对德国大学系统构成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制度规则主要是:国家与大学紧密联系,却又不损害大学本身的学术自由;德国大学在知识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并倡导研究与教学相统一;最后,在德国分权化的政治背景下,大学之间的自由竞争推动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68(2010)03-0040-11

一、关于“制度”概念的讨论

本文试图证明“德国大学”不仅是世界社会中某一特定地区的大学的名称。“德国大学”更是一种独特的制度,这种制度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因此可将其作为一种分析模型,并与大学的其他历史类型进行比较。

但在社会学术语中,制度这一概念究竟作何解释?在我看来,最有意义的理解是将制度定义为“众多遵守者的期望之集合”(convergence of the expectations of many observers)。这种期望直接指向具体的社会实践,如果你遇到的人碰巧与你不具有相同的期望,你不会因为这种僵局而就此放弃,你会转而寻求任意第三者(the third observer)的期望,因为你假定任一第三者必然认同你对该情况的解释。^①换句话说,这种理解意味着对各自的期望均有规范性的解释。即使某些个体的行动使期望落空,组织的成员也会依旧保留着希望以对抗这种阻力。

大学系统由遵循此种制度规则的人群组成,而大学系统的历史发展及其历

收稿日期:2010-05-24

作者简介:鲁道夫·施迪希伟(Rudolf Stichweh),男,德国卢塞恩大学校长,教授。

^① 对于制度这种理解参见 Luhmann 1972, Vol. I, Ch. II, 4。“第三者”(the third observer)的概念是这篇文章中至为关键的见解。

史变化意味着形成制度规则和惯例的基本人群发生变化。^① 这些变化包含着期望与规则的消逝、转变和创新。很显然,这样一种变化的方式接近我们所理解的组织进化理论。

二、德国大学系统(17世纪—21世纪)

本文所关注的历史单元是从17世纪到21世纪的德国大学系统,我们可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观察到该系统及其要素之特点的连贯性与持续性。我们要研究这一段某种程度上“自足”的历史,一个可能的起点是探讨哈勒大学(布兰登堡,普鲁士)于1694年的建立,它可以被认为是德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下文中我们要讨论的哈勒大学的许多特性,在历史中都是第一次被引进。^② 讨论的结果自然归于当前的情况,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卓越计划”(开始于2006~2007年,第二阶段于2010年开始)为特征,该计划试图识别“优秀群体”并在德国大学中定义“未来所需的概念”,向在相关领域具有资质的大学给予集中支持。^③ 卓越计划根植于一个明确的共识,即当前的德国大学正在国际范围内失去其曾在1750~1933年拥有的领先地位,对此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在德国始终存在相当数量的大学,这是由德国分权化的政治状况造成的:1789年在法国革命开始时,德国有34所大学;1815~1914年间,这个数量是20或21;而今天的德国有88~110所大学^④(数量多寡取决于过去二十年中有多少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可以算作大学)。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德国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够进入大学学习——在1700年左右,德国仅有2%的男性人口接受了一定时间的大学教育。大约到18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左右(这种变化很可能反映了高级文法中学的改善,大学不再代替高级文法中学和其他中等教育类型——有时甚至是小学——的功能)。^⑤ 整个18世纪,德国大学都没有女学生,直到1900年左右情况才开始改善。两百年之后,男女适龄人口中均有约25%~30%的学生进入大学。^⑥ 如果把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在内,同时把那些在中学毕业多年后再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也包括在内,这个数字将达到40%。^⑦

① 此论点涉及最有影响的经济与组织进化理论,见 Nelson and Winter, 1982; cf. Nelson and Winter, 2002。

② 可比较 Stichweh, 2008。

③ 具体内容参见 <http://www.wissenschaftsrat.de/arbeitsbereiche-arbeitsprogramm/exzellenzinitiative/>。

④ 在此我们将能够授予博士学位作为判定大学的标准之一,故而德国有88所国立大学和22所私立或教会大学(详情见 <http://www.hochschulkompass.de/hochschulen/statistik-hochschulen-nach/traeger-schaft-und-bundesland.html>; 3月21日,2010年)。此外仍有许多无权授予博士学位的私立教育机构。

⑤ 图表可见于 Frijhoff, 1979, p. 212。

⑥ 参见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07a, p. 10。在2005和2007年,该比例是37%(这包括高等专科学校,即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

⑦ 可比较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09。

1789年,在后来的德意志帝国领土上的34所大学中就读的学生总数约为7900人。这些学生有40%集中在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每一所都拥有800~1000名学生。其他30所大学平均每所拥有约150名学生。^①二百多年后,学生整体人数增加了约200倍,约有140万大学生。^②由于大学的数量仅增长了2.5倍,就意味着平均每所大学较其在1800年的规模都增长了100倍(从平均有150名学生到15000名)。2006年冬季,在德国最大的十所大学中,其学生规模的范围是从45000人(科隆大学)到32000人(德累斯顿大学)。就规模而言,这标志着学生分布比1800年的情况更加均衡,不存在“巨型大学”支配整个大学系统。另一个主要的观察结果是系统中学生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我们不得不追问高等教育系统的其他特征将受此影响。

三、制度规则:国家机构

德国大学通常都是国家机构,由州政府建立、资助和控制,在这些控制性的机构和人员中,总有一些——可以是18世纪德国大学的校务长,也可以是20世纪的德国部长——属于大学历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改革者。此外,我们可以在典型的大学生职业与专业前景中看到大学和国家的紧密联合:大学首先为政府培养公职人员,顺带培养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员。

在17和18世纪,这种大学和国家的联合意味着国家的多元性与大学的多元性相耦合——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存在着许许多多完全不同的区域单位,仅有部分地区拥有自己的大学。今天,在统一后的德国仍然有16个州——任何一个都拥有至少一所州立大学。另一方面,德国并没有哪一所大学属于整个联邦政府,因此避免了可能伴生的不平等。^③

在美国,同时期的高等教育史是大学与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相关联的历史;而在德国,尽管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分裂在近代早期(16~18世纪)的情况十分突出,并且像哥廷根这样的世界性大学试图吸引宗教分裂的双方,但以国家为中心的大学总是削弱高等教育与宗教的联系。今天德国唯一的天主教大学在艾施塔特(与英格施塔特合并),所有其他大学都与宗教无关。

最后要提到的重要的一点是,德国的私立大学相对弱小。它们仅拥有所有大学生中的0.9%(但它们在应用科学大学中更重要)。全德国仅有五所私立

① 参见 Turner, 1987, 221。

② 2009年10月时有1415503名大学学生,其中704000名学生就读于高等专科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参见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0, 6。

③ 有两个军事大学是例外,分别是慕尼黑联邦国防大学和汉堡联邦国防大学。

大学的学生超过1000人。^①私立大学高度专门化,往往只有一个专业,最典型的便是商科;同时,它们中有很多都缺乏健全的财务基础。因此,除非私立大学能够扮演一些实验性的角色,尤其是在课程和教学方面,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之间的竞争态势很难在未来几年的德国出现。它们可以吸引一些知名学者,无论是年轻或年老的(通常在德国65岁后学者都会退休),而这可能给私立大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知名度。

四、制度规则:国家拨款

德国大学政府主导的必然结果是,它主要由国家预算支持。对比美国大学,德国大学并不基于多样化的经费来源。直到最近,德国大学才开始对学生收费。近些年来,一些地区和州的学生每学期要支付500欧元的学费。但是,学生学费并不构成大学发展规划的策略性的一部分,这一点没有改变。

但即使在德国大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几年中大学重拾了对私人捐助充当大学经费之一部分的兴趣。私人捐助所扮演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年月里十分突出,特别是在科隆、法兰克福等新建的城市大学中。这种做法与犹太家庭的社会整合及其财富积累相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末被终止。慢慢地,这一时期大学的某些特点再度出现。法兰克福大学的建立依赖于这种20世纪早期的趋势,法兰克福大学现已成功地再次成为财务上更加自主、更加吸引投资者的机构。这种对筹款的程序性关注可以在今天的许多德国大学中看到,如同在其他欧洲国家。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德国大学成功筹措到与大学总预算显著相关的捐款。^②

五、制度规则:自治权

在德国大学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的最重要的规则恐怕就是自治权了。关于德国大学的自治权,其最古老的历史语义学术语是“学术自由”(libertas academica),它首先意味着免于外部的干预。^③在17、18世纪间,“学术自由”意味着一种假定,即政治和警察当局要自我克制,不能对学校生活进行直接干预,他们必须尊重大学和一些其他类型学校的自治的学术裁判权。

这种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政治一司法解释从18世纪开始转变,并最终在19世纪形成了一种知识的解释。学术自由现在指的是教师和学生角色之间的

^① 这五所大学是柏林斯泰恩拜斯大学(4002人)、厄斯特里希·温克尔欧洲商学院(1295人)、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学校(1207人)、不来梅国际大学(1199人)、维滕-黑尔德克大学(1037人),他们中多数都明确地聚焦于商学(参见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0, 30-32)。

^② 关于捐资的功能意义,可比较 Hansmann, 1990。

^③ 关于学术自由,可参见 Stichweh, 1994b, Ch. 13。

相互关系,并指出知识的自由适用于此种相互关系的双方:对大学教师而言,它是指教学自由(Lehrfreiheit),在哈勒大学建立后便意味着学者可以根据其科研工作的方向而自由地在宽广的问题范围和研究方法中选择;至于学生,与教学自由相辅相成的是学习自由(Lernfreiheit),这种自由使他们有权不被绑定于严密规定的学校课程,而是在复杂多元的学术选择中走出一条属于个人的道路。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将其与德国学术传统相比较,博洛尼亚模式便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创新。^①

紧随德国独立国家地位在历史变化过程中政治自由的发展,出现了关于学术自由的进一步解释。学术自由有时变成了政治自由的替代品。德国并不属于西方自由政治传统的先驱国家,在这里,在专制、狭小的德国各州中,对于生活的限制暗示一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大学可能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自由的组织,在大学中内心的态度被社会化了,这允许人们在地区和政治的限制情况下保持内在的智力自由。

最后一点是,学术自由的概念与学术空间的迁移紧密相连。只有教师和学生可以在德国学术空间里所有大学之间自由流动,对学术自由的限制才可能不会被制度化,因为限制是激励学生、老师流动的原因之一。新自由的制度化会将这两类人吸引到自治权按此种方式加强的地方。哥廷根大学在1737年成立后不久便成为1750~1780/1790年间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样的成功案例为本部分关于学术自由的论点提供了良好例证。通过师生迁移而形成的大学间的相互关系,是德国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能够形成一种相对平等的空间的原因之一。可能卓越计划只能略微改变这种情况。^②

六、制度规则:教育

正因对自治和自由的突出关注,德国大学没有将自己视为教育机构。学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拥有自由的成年人。自立以及在广泛的哲学、文学甚至社会学背景下强烈的个性观念,都是“学生”这个语义学综合体的另外的要素。^③很容易发现这种对教育和教育理念疏远的历史性以及结构性的原因。德国贵族作为德国大学的普通一员从未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在其他国家教育理念往往与培养贵族子女的急切需求相连。此外,德国没有学院(college),没有在学院式环境中将生活和学习相结合的机构——学院也是阐释高等教育理念的重要场所。

从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时期之后,德国大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教育理

^① 在本文中我没有过多地谈及博洛尼亚进程。其社会学阐释可参见 Stichweh, 2010。

^② 可比较 Kaube, 2009。

^③ 可比较 Stichweh, 1994b, Ch. 9。

念——“修养”(Bildung)。“修养”的含义可从各式各样在为这个德文词汇寻找英文对应词的尝试中发现。许多译者选择使用“自我培养”(self-cultivation)或“自我形构”(self-formation),有趣的是“修养”中所包含的自反性“自我”的成分。“修养”看起来总是由各自的系统在与其自身的关系中实践的。就语义核心而言,“修养”这一概念确切地阐释了一种更加深入的相互关系,即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且这种相互关系显然不是由教师(的教育实践)从中促成的。它充其量可能被某些教师激发,他们使学生看到其自我与世界之关系,他们可能会支持学生于此进行相应的努力。

七、制度规则:科学

大学首先是一所科学知识的机构。这一特征在德国案例中较任何其他大学传统更为突出。应注意这种德国式的认识却是基于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概念——“科学”(Wissenschaft)。“科学”包括法律^①、神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以及19世纪后出现的技术科学。与这种对“科学”的包容性认识相对应的,是一种对于综合性大学(Volluniversität)的结构性偏好,这表明了一种关于大学的百科全书式观念,意味着大学应该设置与所有知识类型相关的学科。此种结构性的偏好可能源于“专科大学随时间的推移试图变成完全大学”的预测。这可以在德国技术大学历史性崛起(正如在美国)的过程中观察到,这样的崛起塑造了两类高等教育机构在系统中的对称地位,甚至在德国一流的技术大学拥有某种优势之今日。^②

关于科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假定。它源于一种可归于德国大学的进一步的语义发明。^③这个假定的盛行再次证明了教育理念之缺失,因为“知识的研究过程与宣讲传播的紧密结合”,代替了原本的教育理念和制度。

八、大学系统的系统性质

以期望结构和规则为基础,德国大学系统表现出了某些系统性质。其中,在分权化系统中众多大学间的竞争可能是最突出的。^④其进一步的含义是,在

① 具体案例研究可参见 Stichweh, 1992。

② 关于工程与自然科学在德国的强势地位,可参见 King, 2004, esp. Figure 3。德国技术大学的兴起似乎与德国大学的弱化有关,后者是因为“威廉皇帝学会和马普学会”的建立(分别在1911年和1948年)。特别是马普学会从应用科学转向基础科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大学,可比较 Hohn and Schimank, 1990, Ch. 4。

③ 可比较 Stichweh, 1994a。

④ 关于此点较有影响的论断,可见 Ben David, 1971。

这种系统中存在着较强和较弱的机构;但不应该存在不重要的机构,其中的参与者以为他们并非大学系统的真正部分。避免这种边缘化效应是德国传统的长处之一,而如果德国延续这种系统性质,当前“卓越计划”的结构性效果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更深入的系统性影响与作为专业人员的教授的职业生涯结构有关。在这方面,比较世界上多数大学系统,应该说德国大学确实是教授的大学。作为教授的大学,意味着主要的结构性决策是决定某个职位的聘任。结构形成于是通过新教授进入组织而完成,他们带来了新的专长和能力。德国大学这样一个国家系统通过全国性的职业结构而形成,所有高等学校包括在系统之内。这与招聘本地教授极不相容。学者在其学术生涯中通过大学系统进行流动,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就在院校层次中得到提升。甚至那些在知识和财政方面较弱的大学也是系统的一部分,其典型作用是为年轻学者提供最初的职业位置。

九、城市与大学

在政治意义上,德国历来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分权的。在近代早期的德国,有上百的公国和自由城市,而今天仍然存在着16个“州”。在此情况下,德国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城市,直到柏林在19世纪成为真正的大都会。此外,城市间还存在着功能分化,其中一些成为政府所在地,其他的主要成为拥有大量卫戍部队的军事城市。因此,作为其自身的一种功能类型,相对较小的大学城出现了——图宾根、耶拿、马堡、弗莱堡、海德尔堡、哥廷根,这些城市即使今天也是大学城很好的例子。自1808年后,大都会大学(metropolitan universities)慢慢加入德国大学系统——如柏林、慕尼黑,以及20世纪仅有的科隆、汉堡和法兰克福。现在德国大学系统的特点仍然是围绕这两种类型的分叉。最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校园式大学以某种方式偶然进入大学体系(如波鸿、比勒费尔德、康斯坦茨),但它们缺乏明确的科学或教育特点。它们创立的原因主要与“要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中等规模的区域性大学”的政治意图有关——这是一个教育扩张与新人群融入大学的阶段。

十、职业生涯

我已经提到了最终成为教授的学者的职业生涯结构。当然,大多数大学生从未打算成为科学家和教授,但他们通过“修养”(自我培养)和“职业”(Beruflichkeit)的概念与大学传统的核心相连。^① 一个人所选择的职业通常被解释为一种“使命”,每个人只有通过“召唤”才能进入。“召唤”,在此是指一种关于职业

^① 相关案例研究可参见 Olesko, 1991 以及 Conze 的 *on Beruf* (1972)。

选择的内在自我经验,这种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要的选择,而不是以任何其他方式必须为之的。“自我培养”与“专业性”的概念产生了一种形式,个人在其中能够终生保持与大学传统的联系。这种与知识理想及其职业影响的普遍性关联,在功能上与美国某些大学的“校友”概念等同,意味着作为现在的“成员”——而他初来时只是一名学生——与院校之间更为具体的联系。

十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大学在德国社会中曾经拥有非凡的社会地位,这与大学教授的优越身份相呼应。特别是在1900年左右,在上层社会精英阶层中他们拥有其安全地带。^①同时,这可能是大学教授对政治事务和公共观念影响最大的时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学者政治”(Gelehrtenpolitik)一词表明了当时学者对所有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群体之巨大影响。^②但是,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大学和学者的角色转向其他社会精英身份。在德国,这种转变在历史与当前都极少发生。我们很少看到一位大学教授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承担了德国某一州政府部门的职责。当然也有例外:在德国2005年大选中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一位宪法学者以税收改革的方案竞选某一高级政治职位,来自其他政党的竞选领袖称他为“那个教授”,从而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形象。这种对于学者活动空间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作为知识的所有严肃的类型之代表所赋予他们的一种特权相平衡。^③这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状况、并且独立于大学和学术在德国并非突出现象的原因——这在18世纪是确实的,在当今或多或少仍然如此。^④

要提及的最后一个特征与世界主义有关。本文所关注的这一时期的德国大学总是具备相当的世界性——世界主义主要意味着对外国学生及其可能带来之影响的开放性。但这种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外国学生可以再在德国高校发展其学术生涯。最迟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外国学生通常回到自己的祖国,并担负起本国大学结构制度化的责任,这种制度化某种程度上源于德国范式。^⑤他们极少留在德国大学成为教授,这意味着德国大学系统在其历史上从未意识到通过引进多元化移民背景的人才以追求并达到的卓越之处。这与美国的情况有明显区别。

① 一个关于物理学的半虚构的有趣描述可参见 McCormach, 1982。

② 参见 vom Bruch, 1980。

③ 可比较 Stichweh, 2004。

④ 下此论断必须谨慎。首先存在着一些德国作家为自己定义了知识领域,却很少成为大学教授,他们中一些人在知识方面极有影响;当前有许多人通过电视成为“知识分子”;也必须提到自主的电影界和戏剧界。一个所谓“最有影响力的500名德国知识分子”的西塞罗排名十分有趣,可参见 <http://www.cicero.de/839.php?ausgabe=05/2007>。

⑤ 可比较近期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参见 Löser and Strupp (eds.), 2005。

十二、结论：基本规则创造大学系统

在本文涉及的许多特征与组织规则中,可以说有些与大学系统的构成规则有特别的关联。我将论述这种制度规则的核心。

首先必须再次指出的是国家和大学的紧密联合。在德国大学的历史上,国家并不主要作为一种压制性和限制性的力量,而是大学生活中富有价值的结构的授权者。国家没有危害“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的概念可能成为大学的第二项基本规则,相反,国家有时被视为依赖于“学术自由”,因为大学——作为其最突出的自我描述——出现后拥有独立的建议发言权,而政府从开明的意义上迫切需要了解自己的任务。^①对大学传统而言十分重要的知识的普遍性及其代表政府权力利益的普遍性,应该争取最广泛的理解,它们在德国的发展中休戚相关。

第三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在知识上具有高度的包容性。知识之所有相关的社会形式最终在大学中得以制度化,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的百科全书式机构,大学体现了知识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在德国,大学是知识社会中最根本的机构。^②知识需要不断的修正和革新,“研究”成为启动知识持续更新的各种活动的制度术语。就大学而言,由此产生为了保证知识持续更新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而这成为一种习惯,通过一种与知识发展紧密相连的大学教学灌输给学生。

最后,第五个特点是:“国家计划”或“劳动分工”从来不是有效地设计大学系统结构的最佳隐喻,分权化体系中的竞争才是该系统最突出的结构特征。当代的每一项改革都应当在明确的分权化系统中着重加强这种竞争的特点,而不应该用科层化结构替代它。

参考文献

- [1] Ben David, Joseph. (1971). *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 [2] Brandt, Reinhard. (2003). *Universität zwischen Selbst- und Fremdbestimmung. Kants "Streit der Fakultäten". Mit einem Anhang zu Heideggers "Rektoratsrede"*.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Sonderband 5). Berlin: Akademie Verlag.
- [3] Conze, Werner. (1972). Beruf. pp. 490-507.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edited by Brunner, Otto et al. Vol. 1, (Stuttgart: Mohr).
- [4] Frijhoff, Wilhelmus Theodorus Maria. (1979). Surplus ou deficit? Hypothèses sur le nom-

① 这显然是伊曼纽尔·康德的立场,见 Kant, 1798; 作为比较可参见 Brandt, 2003。

② 参见 Stichweh, 2006。

- bre réel des étudiants en Allemagne à l'époque moderne (1576-1815). *Francia*. 7: 173-218.
- [5] Hansmann, Henry. (1990). Why Do Universities Have Endowment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 no. 1: 3-42.
- [6] Hohn, Hans-Willy and Uwe Schimank. (1990). *Konflikte und Gleichgewichte im Forschungssystem*. Akteurkonstellationen und Entwicklungspfade in der staatlich finanzierten auss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 [7] Kant, Immanuel. (1798). 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 pp. 261-393. *Werke Bd. 9*, edited by Weischedel, Wilhelm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5).
- [8] Kaube, Jürgen (ed.). (2009). *Die Illusion der Exzellenz. Lebenslügen der Wissenschaftspolitik*. Berlin: Klaus Wagenbach.
- [9] King, David A. (2004). The Scientific Impact of Nations: What Different Countries Get for Their Research Spending. *Nature*. 430: 311-316.
- [10] Löser, Philipp and Christoph Strupp (eds.). (2005). *Universität der Gelehrten-Universität der Experten. Adaptionen deutscher Wissenschaft in den USA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Transatlantische Historische Studien 24;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Deutschen Historischen Instituts, Washington D. C.).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 [11] Luhmann, Niklas. (1972). *Rechtssoziologie*. Vol. 1-2. Reinbek b. Hamburg: Rowohlt.
- [12] McCormach, Russell. (1982). *Night Thoughts of a Classical Physicist*.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3] Nelson, Richard R. and Sidney G. Winter.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4] Nelson, Richard R. and Sidney G. Winter. (2002).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no. 2: 23-46.
- [15] Olesko, Kathryn M. (1991). *Physics as a Calling: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in The Königsberg Seminar for Phys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 Press.
- [16]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ochschulen auf einen Blick. *Ausgabe*. 2007. 1-48. 2007. Wiesbaden: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 [17]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ochschulen auf einen Blick. *Ausgabe*. 2009. 1-48. 2009. Wiesbaden: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 [18]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Studierende an Hochschulen. *Wintersemester*. 2009/2010. 1-75. 2010. Wiesbaden: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 [19] Stichweh, Rudolf. (1992). Motive und Begründungsstrategien für Wissenschaftlichkeit in der deutschen Jurisprudenz des 19. Jahrhunderts. *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11: 330-351.
- [20] Stichweh, Rudolf. (1994). The Un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pp. 189-202. *Romanticism in Science: Science in Europe 1790-1840*, edited by Poggi, Stefano and Maurizio Bossi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52), (Boston / Dordrecht: Kluwer).
- [21] Stichweh, Rudolf. (1994). *Wissenschaft, Universität, Professionen: Soziologische Analys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 [22] Stichweh, Rudolf. (2004). Wissensgesellschaft und Wissenschaftssystem. *Schweizerische*

-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30, no. 2: 147-165.
- [23] Stichweh, Rudolf. (2006). Die Universität in der Wissensgesellschaft. *Soziale Systeme*. 12, no. 1: 33-53.
- [24] Stichweh, Rudolf. (2008). Zur Funktion der Universität für die deutsche Frühaufklärung. pp.31-43. *Strukturen der deutschen Frühaufklärung 1680-1720*, edited by Hans Erich Bödek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25] Stichweh, Rudolf. (2010). Universität nach Bologna. Zur sozialen Form der Massenerziehung/ Universität in der Weltgesellschaft (= Luzerner Universitätsreden, Nr. 19). Universität Luzern (http://www.unilu.ch/files/Luzerner_Unireden_19.pdf).
- [26] Turner, Roy Steven. (1987). Universitäten. pp.221-249. *Handbuch der deutschen Bildungsgeschichte*. Vol. 3. 1800-1870-Von der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bis zur Gründ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edited by Jeismann, Karl Ernst and Peter Lundgreen (München: Beck).
- [27] Vom Bruch, Rüdiger. (1980).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öffentliche Meinung: Gelehrten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1890-1914)*. Husum: Matthiesen.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子瑜 译)

(责任编辑 范皓皓)

“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面临的挑战与经验”

中国—芬兰高等教育论坛隆重举行

2010年4月26~27日,主题为“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面临的挑战与经验”的中国—芬兰高等教育论坛在北京工业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中国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大学、芬兰坦佩雷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联合举办,由北京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承办。论坛期间,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张力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蒋毅坚教授、芬兰科学院院长 Markku Mattila 教授、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黄福涛教授、德国卡塞尔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国际中心前主任 Ulrich Teichler 教授、芬兰坦佩雷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组/管理研究系主任 Seppo Holttta 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万华教授和阎凤桥教授、芬兰驻中国大使馆科技参赞、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Juho Rissanen 先生分别围绕着会议主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另外还进行了分组报告和讨论。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Rules and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ZHOU Xueguang

Page 2

In this study, I examine the role of rule-following in organizations and its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rawing 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I develop a broad concept of rule-following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xpectations in which formal organizations are situated. By contrasting models of rational choice, collective rationality, and contextual rationality, I discuss thos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mechanisms that induce rule-following behaviors, lea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cision makers, and frame decision situations. I als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rule-following for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change, and innovation.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How Complexity Breeds Autonomy

David F. Labaree

Page 24

This essay shows how the peculiar structure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helps explain its success in world rankings. This structure combines contradictory goals, constituencies, sources of funds, and forms of authority in a creative tension. One tension is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Another is across three visions of higher education—the undergraduate college (populist), graduate school (elitist), and land grant college (practical). The third is the system's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rational, and charismatic authority. In combination, these promote 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 radical stratification, broad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partial autonomy, and adaptiv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German Universities

Rudolf Stichweh

Page 4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institutions, this essay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university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Basing on the large amou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tried to find out the basic rules sup-

porting the “German University” as an institution. Throug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ison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text of German university is outlined. 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 key systems of rules which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German university constitution are as follows: Firstly,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were closely linked, but the academic freedom were not endangered; Secondly, the university as an institution was very inclusive in terms of knowledge, and the un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ensured the continuous renewal of knowledge; Finally, in the decentralized political landscape in Germany, the free competi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greatly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Founda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 System in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ies

ZUO Yuhe

Page 51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planting western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China has founded and improved its own research institution system in modern universities. The founda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e in Peking University provided an example for others to follow.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School in University*, enac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witnessed the normaliza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 system in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ies. At the time while the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were underdeveloped, the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s not only fulfilled the function of graduate school such as training graduate students, but also played a particular role in academic research.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Guoxue* Institute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Guoxue* Research Institute are typical examples. However, with the prevalence of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since 1930s, the distinctive functions of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 institutes have gradually been identifie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mainly orientated to training graduate students while independent research institutes provide a place for academics to be fully engaged in profound research.

In Search of Space for Objective Dialogue: A Study on History Book Reviews in Periodicals and Newspapers in 1930s in China

LIU Longxin

Page 65

Book review is a new genre emerging with the springing up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modern China. Since history became an established discipline around